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著

信息经济学：基本原理

(上)

 中国金融出版社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人
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信息经济学：基本原理（上）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Basic Principles

[美]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著
纪沫 陈工文 李飞跃 译

 中国金融出版社

总策划：林铁钢
责任编辑：何 为
责任校对：孙 蕊
责任印制：裴 刚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信息经济学：基本原理（上）(Xinxi Jingjixue: Jiben Yuanli)/(美)斯蒂格利茨(Stiglitz, J. E.)著；纪沫，陈工文，李飞跃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1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1)

书名原文：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Basic Principles

ISBN 978 - 7 - 5049 - 4914 - 1

I. 信… II. ①斯…②纪…③陈…④李… III. 信息经济学—文集
IV. F062.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1883 号

出版
发行

中国金融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广安门外小红庙南里3号

市场开发部 (010)63272190, 66070804 (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63286832, 63365686 (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66070833, 82672183

邮编 100055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尺寸 169 毫米×239 毫米

印张 17

字数 289 千

版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ISBN 978 - 7 - 5049 - 4914 - 1/F. 4474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63263947

钱颖一为本书作的序

(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

中国金融出版社推出中文六卷本的《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展示了斯蒂格利茨教授对现代经济学科学的学术贡献。10年前(1997年5月)，当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文版在中国面市时，曾经掀起购书热潮，销量达十万册以上，创下当时的销售纪录。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1998年陪同斯蒂格利茨教授到中国人民大学讲学时签名售书的盛况。中国的广大读者多是通过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认识斯蒂格利茨的。时隔10年，《文集》出版，这使得中国读者可以通过阅读他的论文原文，理解《经济学》教科书背后的严谨的理论。阅读经济学论文的原文，对于深入理解现代经济学并以此为基础从事前沿的经济学研究，是不可替代的。

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的斯蒂格利茨教授也是最为多产的经济学家之一。迄今为止，他发表了数百篇经济学学术论文，而这次收集在六卷《文集》中的107篇论文还不到其论文总数的四分之一。当代另一位多产的经济学家是萨缪尔森，他是斯蒂格利茨在MIT读博士时的导师。有趣的是，萨缪尔森和斯蒂格利茨都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市(Gary, Indiana)。一个不大的美国中西部城市出了两个大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在为斯蒂格利茨写的一封推荐信中说，“斯蒂格利茨是印第安纳州加里市出来的最好的经济学家”。不知情的人也许会以为这是一句不太恭维的话，但知情人知道这也许是萨缪尔森写出来的最强有力的推荐信了。

斯蒂格利茨在经济学中的研究兴趣非常广泛。现在多数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研究集中在某个领域，但斯蒂格利茨则不同，他对很多经济学分支不仅

都有兴趣，而且也有研究。有一次在美国经济学会会议登记时，他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一栏中填写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这包括了经济学的几乎所有领域。他的学术研究的广泛性充分体现在这套《文集》中：《文集》的第一卷、第二卷是关于信息经济学，第三卷是微观经济学，第四卷是宏观经济学，第五卷是公共财政，第六卷是发展经济学。在每一个领域，他的研究既有奠基性的理论工作，也有对于具体问题的应用。

在斯蒂格利茨对现代经济学的诸多贡献中，人们公认最重要的贡献是在信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对非对称信息的研究方面。这使得他成为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因此获得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他也因此在1979年获得美国经济学会授予的克拉克奖（Clark Medal）。该奖每两年颁发一次，一次只发给一个人，是除诺贝尔奖之外经济学界荣誉最高的奖项。

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对市场交易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制度安排。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们发现，不仅是信息不完全，更重要的是信息不对称，会导致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后果。不对称信息由此成为经济学理论上的重要突破，并对经济学的各个分支产生了巨大影响。斯蒂格利茨在非对称信息的研究上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他把他在理论上的洞察力，应用于看上去没有关联的不同市场。举例一，土地市场。在农业土地租赁市场上，农民与地主用固定比例分成是普遍流行但又费解的一种合同形式。他的研究发现，如果考虑到实际中农民比地主掌握更多的有关生产的信息，那么分成制就比固定地租的合同形式更有优势了。举例二，信贷市场。斯蒂格利茨引入了信息不对称，即借款人有高风险和低风险之区别，但这一信息只有借款人自己知道而贷款人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推导出降低利率反而有可能使贷款人的利润上升，这是因为低风险借款人在总借款人数中的比例会因此而上升，这可以缓解贷款人面临的逆向选择问题。这样，他的理论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不受干预的市场的均衡利率水平上仍然可能形成信贷的需求量大于供给量。举例三，劳动力市场。斯蒂格利茨将非对称信息引入劳动力市场，比如雇主不能完全清楚地知道雇员工作的努力状况。在这种情况下，雇主会出于利润的考虑，给雇员高于市场价格的工资，激励雇员努力工作。这种高于供求平衡的工资被称为“效率工资”。其结果是市场均衡时的工资会使得劳动力的供给量大于需求量，造成失业。这一结果是在工资是灵活的条件下降得出的，因此很有意义。

以上几个例子的原始论文都已经成为经典论文，均收集在这次出版的

《文集》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市场并不会总是有效率的。但是，这并不能立即推出其他的资源配置方式，比如计划或政府干预，就一定会比市场更优越。同样的，信息不对称这一原因也会限制，通常是更大程度地限制，计划或政府干预的作用。正如斯蒂格利茨在第一卷的引言中所说，理解信息不完全性的影响，不但有助于我们理清市场失败原因，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其他替代性模式，比如计划和政府，通常也会失败的原因。引入不对称信息，一方面可以让我们发现市场的局限，另一方面也让我们发现市场的一些还不为人们所知的潜在力量。在市场经济中，决策是分散而非集中的，这一方面可以使人们有效地利用分散的信息，另一方面市场竞争可以导致新信息的提供。所以，引入不对称信息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分析市场和非市场的运作，更加现实地比较各市场和非市场的有效性。斯蒂格利茨的研究推动了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改变了我们认识经济行为和现象的方式，也为我们的制度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我个人有幸同斯蒂格利茨教授相识近二十年。我们在斯坦福大学同事多年。在课堂上，我教授过他的多篇论文。在研究中，他的论文和同他的交谈对我都有很大帮助。我和他一起合作完成一篇论文，这次收集在《文集》中。斯蒂格利茨教授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极为关注。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不久，我和他一起从香港到珠海、深圳、广州等城市考察。我特别带他参观了广州的农贸市场。当他看到珠江三角洲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时，极其兴奋，说这不能叫做增长，应该叫做超级增长（super growth）。那是一次难忘的旅行。

林毅夫为本书作的序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六卷本《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件值得我国经济学界庆祝的好事，尤其是希望通过学习现代经济学来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学子们都应该为此感到高兴。这套文集不仅让我国的经济学界有机会较为系统地了解一位当代经济学大师的贡献，而且，也将使得我国的经济学界有机会了解到一套以新的范式构建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

现代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后开始逐渐建立起来，其间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以市场中的所有参与者信息是充分的，调整是瞬时的，不存在交易费用，各种产品、金融、保险市场是完备的为范式来进行经济理论研究。根据这个传统范式，市场是一个最有有效的制度安排，市场中的每个决策者的自利行为将会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政府只在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以维持社会秩序和市场的正常运转。最早对上述范式提出修正的是凯恩斯，他从对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的研究中，观察到市场工资调整具有粘性，放弃了瞬时调整的假设，据此建立起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罗纳德·科斯则从对工厂制度的考察中提出交易是需要费用的，开启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乔治·斯蒂格勒则放弃了完备信息的暗含假设，提出了信息不充分，信息有价值，信息的获取有成本，使信息成为现代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考虑变量。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其他另外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和麦克·斯彭斯则进一步提出，不仅信息是不完备的，而且信息的分布在生产者、消费者、所有者、委托代理者之间是不对称的。对上述标准范式的修改使现代经济学得到巨大发展，在新的范式中，市场竞争不再必然会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可以发挥比“守夜人”更为积极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信息不充分、不对称、交易费用高的情形比发达国家中严重，因此，根据新范式的理论所发展出来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具有参考借鉴价值。但是，传统的范式以其简单、在数理模型中易于处理而在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中仍然被作为一个基本范式，经济学的入门教科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是在传统的范式之上，除了深入研究当代经济学的学者，普通人很容易就接受这样的理论体系。尤其，发达的国家以自由竞争的市场为其基本的经济体制；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在20世纪50、60年代为了赶超发达国家而推行了许多违反比较优势的政策，使得赶超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只有依靠国家对市场竞争的直接抑制来保护补贴才能生存下去，效率非常低，导致了各种危机。因此，两相比较特别容易使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低效率是由于市场制度的不完善所引起，而接受了传统范式所作的各种政策建议，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由于市场化程度不足，解决之道在于消除政府的干预，只要让市场发挥作用，一切问题就可以消弭。这种看法在我国的学界也普遍存在。

理论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了解现象，进而改造现象。然而，错误的理论就像错误的地图，经常会误导人们走入歧途。根据传统经济理论范式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使得许多计划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陷入了困境，我国的改革开放在缺乏理论指导的条件下，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来进行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我国向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型尚未完成，卫生、医疗、教育、社保、国企、财税、金融等一系列领域如何深化改革，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部门存在着诸多争议，这套文集所呈现的理论体系和分析范式将可以开启我们理论研究和政策讨论时的许多新思路。

这套文集所选的107篇论文篇篇都是原创性的经典之作，阅读这些文章时，除了欣赏其数学模型的精致、理论逻辑的完美之外，读者更要去了解为何斯蒂格利茨教授能够如此具有原创性？无他，来自于他对真实世界的关心。在大学时代他就热衷于政治和社会改革，1963年8月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领导反对种族主义的和平示威并发表“我有一个梦”的演说时，斯蒂格利茨是那场示威的参与者之一。他这种对社会、对真实世界的关心促使他出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并参与和挑起了许许多多的政策辩论。我曾有一次问他是何种机缘使他放弃了传统的经济学范式，他告诉我，他小时候在他出生、成长的加里城（位于芝加哥之南、密执安湖畔的一座著名钢都）看到许多不得不失业的工人，可是，

根据传统的范式所建立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却说，那些工人是自愿失业。我想就是因为关心真实的世界，他才有机会看到传统范式下的许多理论模型的结论和他所了解到的许多真实世界的现象不一致，也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些不一致才促使他有机会提出新的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斯蒂格利茨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是老师、同学们的共识。到2001年他获得此奖时，才58岁，是获奖时年岁最小的几位经济学家之一，可是对他来说这已经算是迟来的荣誉。20世纪90年代中他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主席时，有一次在华盛顿的一个会议上，我问他为何尚未获得诺贝尔奖，他戏称一个经济学家只有在他的理论被证明是错误时才会获得此奖。2005年3月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基金会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峰论坛上，他作为午餐会上的主讲嘉宾，我主持会议并介绍他。利用那个机会我问他现在已经获得诺贝尔奖了，那么，他提出的理论是否也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当然，那是为了增加会场气氛的一个戏问，可是，何尝不是一个严肃的方法论的问题。“道可道，非常道”。经济学的“常道”是所有决策者都是“理性”的基本假设，现成的理论则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的“可道”。所以，只有理论模型所假设的约束条件和现实现象背后的决策者所面对的真实约束条件是一致时，理论模型才反映决策者的理性选择。由于限制条件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制度等因素的不同而差异，任何理论模型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斯蒂格利茨的新范式下的理论模型比传统范式下的理论模型跟转型、发展阶段中的我国更贴近，他的理论对我国更有参考借鉴价值，但是，也不能简单照搬。大画家齐白石教导他的学生：“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要求他的学生学习他的艺术精神，不追求和他的绘画的表面相似。相同道理，在阅读这个文集的文章时，不仅要了斯蒂格利茨的新范式和其理论结论，更要了解斯蒂格利茨的胸怀以及他如何观察真实世界、如何进行抽象和构建理论模型的方法。我国转型和发展中的许多现象很难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我国的改革和发展中的现象也有可能需要放弃传统范式中的某些暗含的假设，提出新的范式才能最终使得理论和现象得到统一。能以这种态度来研读这套文集，那么，这套文集的出版必将能推动我国经济学研究和理论的大发展。

2007年3月于朗润园

作者自序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六卷，以下简称《文集》）的出版，让我感到由衷的高兴。这是中国读者第一次读到我的文集。20多年前，中国开始向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转型。此乃伟大的试验。迄今为止，这场试验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全世界近四分之一的人口的生活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其福利水平也因此而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与此同时，中国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消除贫困。

在转型初期，中国试图从其他国家的经验和经济学知识中学习。1980年，我有幸成为由美国国家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组建的一个小型经济学家团体的成员，与其他经济学家共同商讨中国转型中的重要挑战。在威斯康辛州的 Wingspread 会议中心召开的会议结束后，我们于1981年夏天又到中国访问了三周。从此我开始接触中国及其转型，后来亦多次访问中国。在担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及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我尽力促使美国与中国建立更富有建设性的关系。例如，我致力于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时，美国贸易代表坚持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应当迅速接受发达国家所遵守的条款。我指出，中国虽然很大，但是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中国的低人均收入意味着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当中美关系仍在低谷中徘徊时，我于1996年8月受命担任代表团团长前往中国，为促进两国关系发展而努力。随后，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我更加关注中国经济政策的变化。当然，在观察其他国家能向中国借鉴哪些经验方面，我可能更像一个学生，而不是老师。

不过，《文集》主要不是谈这些经历，而是要展示我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当然，我认为，两者是紧密相关的。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过去一直在努力解决如下根本问题：什么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原因？其本质是什么？政府应该发挥什么职能？

中国已经开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便是在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前，中国就开始思考：究竟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市场经济？美

国式的资本主义与斯堪的纳维亚式的福利国家、欧洲的“社会”模式或日本模式，有着显著的差异。在这些不同的模式中，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不一样的。

长期以来，对于各种模式的优点，一直都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在如何判断一个模式比其他模式更优越方面，也有不少争论。虽然与欧洲的竞争对手相比，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更高，但是如果比较的标准是诸如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之类的能更为全面衡量包括健康状况和教育水平在内的生活水平的指标，那么许多欧洲国家的排名就比美国高。¹ 国内生产总值指标并不能反映环境的恶化、自然资源的消耗、负债（对外国人的债务）和资产（在私有化过程中政府通常会将其所掌握的资产折价出售给外国人）的变化，也没有考虑工人需要工作更长时间并对其家人和自身健康造成重大损害的事实。² 另外，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也不会告诉我们增长是否可以持续。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它根本没有考虑收入分配状况：近年来，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增长，但是几乎所有的增长收益都由最上层的人所占有。绝大部分美国人在 2004 年的状况与四年前相比，是更差了，而不是更好了。在社会底层，贫困人口的数量不断增加。即便是中产阶级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其中包括可能失业而带来的不安全感。5000 多万没有健康保险的人对患上重病之后的状况极为担忧。³

即使人们想从已有的模式中挑选出一个，将其应用于中国，那也是不可能的：制度必须适应和反映一个社会与经济的历史和文化。人们不可能像照葫芦画瓢一样去设计经济体制；而且设计经济体制实在是太复杂了，以至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经济体制在不断变化；在过去的 30 年里，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速度是最快的。运行良好的经济体制是有很强适应能力的，它不但能从自身的错误中汲取教训，还能从其他地方学习经验。从这一意义上讲，运行良好的经济体制是自我矫正的体制。在中国，发生在企业内部以及各级政府的适应和矫正过程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

1 美国位居第十，排在它前面的是挪威、冰岛、澳大利亚、卢森堡、加拿大、瑞典、瑞士、爱尔兰、比利时。参见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5-HDI。

2 比如，与欧洲人相比，美国人每年的工作日更多，节假日更少。

3 批评美国“模式”的人，还会提到美国监狱中囚禁着大量犯人——（从人均角度看）大约是其其他发达国家的 10 倍。监狱中囚犯多，与吸毒的人数众多有关。显然，如果一个社会的囚犯和吸毒的瘾君子为数众多，那就说明这个社会确实在某些方面出了问题。当然，不管在这里提到的还是没有提到的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都不能只归咎于经济体制。

随着改革和适应的进行，观念仍然非常重要：我们对什么导致了经济上的成功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受经济理论影响的。当然，经济理论也在不断变化和适应。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总是在充分就业的情形下运行。虽然有些经济学家将大萧条时期的突发性失业视为市场机制暂时性失调的结果，并因此而忽视失业问题，但是这些分析视角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凯恩斯重新阐释了标准的经济理论。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宣称市场总是有效率的这种标准的新古典主义教条在许多地方仍然盛行。比如，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在确定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推动的发展战略时，新古典教条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我还是一名研究生时，我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始自亚当·斯密，经过两百多年发展（尤其是经过利昂·瓦尔拉斯等数理经济学家发展后）的经济学的核心——标准的竞争均衡模型——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市场经济。其中的许多结论都是错误的，比如，（当不存在外部性和公共物品时）市场经济能实现（帕累托）效率。针对发展和转型而提出的诸多政策建议（有时将其称为“新自由主义政策”或“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就是竞争均衡模型。采用这些政策的国家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与实施另一套政策的东亚国家相比，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更低，收入分配也不平等，上层人士占有了绝大部分增长收益。此外，标准的竞争均衡模型，并不能为中国面临的许多重要政策问题（比如公司治理）提供深刻的洞见。标准模型基本上没有什么办法去分析中国面临的关键性问题——不平等问题。就中国是否有能力创造出足够的工作岗位，吸纳数百万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这个重要问题而言，相信新古典模型的人只会说：“别担心，只要你让工资和社会福利下降到足够低的水平，市场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除此之外，他们就不能提供任何帮助了。

《文集》中的论文提供了另一种分析市场经济的视角，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讲中我将其称为新范式。对于政府的作用问题，新范式给出了清晰而明了的政策建议。新范式强调，重要的是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实现恰当的平衡。而且这种平衡会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虽然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其经济状况仍然在不断变化。有许多人认为，尽管新自由主义政策失败了多次，而且中国没有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中国现在还是应该遵守新自由主义教条，确保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最小化。考虑到过去政府干涉的范围过于广泛，那么很好理解为什么很多改革者会去约束政府。例如，他们反对产业政策（即政府为促进某

些特定部门发展而制定实施的政策) 和利用行政手段来实施货币政策。不过, 矫枉过正是非常危险的。尽管中国在反贫困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是其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却在迅速扩大。在这样一个国家中, 完全反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 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毫无疑问, 自由市场教条会使这些差距扩大, 最终使得实现社会公平的和谐社会无法建立起来。不过, 即便是那些只关注经济增长的人也逐渐认识到: 虽然以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的经济增长目标比较狭隘, 但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政策甚至连这个目标都没有实现。在《文集》的某些文章中, 我会试图解释为什么情况是这样的。

然而, 让自由市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倡导者有那么一点底气的是这样一种信仰: 自由市场/新自由主义政策都是建立在完善的经济理论之上。《文集》中的论文清楚地说明了, 一切都得有根有据。的确, 新自由主义政策以经济模型为基础, 但是这些经济模型建立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假设之上。诸如完美信息、完美的资本市场、能抵抗所有风险的完备的保险市场之类的假设, 对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都不切实际, 更不要说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数学模型的严密性和精确性, 可能会让人错误地相信它们。收录在《文集》中的论文表明, 标准的完美信息、完全市场模型并不稳健。也就是说, 信息不完美的程度即便非常小, 也会极大地改变标准竞争市场均衡模型的所有结论。此《文集》中的论文, 不但说明了旧分析模式是错误的, 而且奠定了新范式的基础。

旧分析模式的问题不只是在于它是错误的, 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 它是危险的。比如, 旧分析模式假设没有失业。然而, 资本主义经济一开始就有着巨大的波动。这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对于那些并非因为其自身错误而失去工作的人而言, 他们所承担的成本尤其巨大。当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时, 这些波动带来的风险也逐渐变大。因此, 理解导致波动的原因, 找到能降低波动幅度并减轻波动的消极后果的政策, 就变得非常重要。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 标准的竞争均衡模型, 不但低估了市场的局限性, 而且还低估了市场的力量。比如, 中央计划之所以会失败, 是因为中央计划机构无法获得必需的信息, 更遑论处理这些信息, 并以此为基础直接指挥经济体中的众多企业了。市场经济的优势部分体现在信息效率之上。然而, 标准的竞争均衡模型几乎没有关注信息效率。在标准模型中, 仅有的信息问题是与稀缺性有关(标准模型并不关心像劳动者的素质、不同投资项目成功的可能性这样的问题), 而且标准模型中的信息问题是那

种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并不经常会发生的问题。标准的竞争均衡模型甚至不会去评价经济体应对某些可能会影响到需求和供给的持续冲击的能力。⁴

市场经济的另一个优势体现在其创新能力上。在讨论以信息和创新为基础的新经济时，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变得更加明显。与中国相比，美国在制造业的许多环节上已经不再具有比较优势；而且，在服务业的许多部门，与印度相比，美国也没有比较优势。但是，美国的优势体现在创新能力上。有了创新能力，就可以生产出能获得知识产权的产品。不过，就像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并不满足于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比较静态优势一样，长远看来它们也不会满足于仅仅充当制造商。如果创新可以带来更高的收益，中国将来肯定是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要理解创新的经济学。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政府突出地强调了创新的重要性。在此《文集》交付印刷时，中国在研究与开发上的支出已经超过了日本。现在，中国的研究与开发支出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但是，标准的竞争均衡模型假定技术不变，即完全不考虑对创新或其他可能影响技术进步速度的决策的支出。

简言之，如果中国要想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继续取得成功，就必须理解市场机制的优势和局限性。而许多研究生院仍然在讲授的标准竞争均衡模型，却不能对此做出准确的评价。《文集》中的论文，就是我为建立新范式而做出的最为系统和全面努力的结晶。

我的研究集中在标准分析模式的一个关键性缺陷上，即它的完美信息假设。市场的许多局限性都与信息的不完美有关。当信息不完美时，竞争就会受到限制；在均衡状态下，也可能会出现失业和信贷配给；许多重要的市场，尤其是保险市场，就发展不起来。因此，新经济分析范式事实上触及了现代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各个方面。我希望收录在此《文集》中的论文清晰地展现了这一点。

下面，我要简要地介绍一下六卷《文集》的结构安排。

第一卷收录了几篇奠定信息经济学基础的论文，包括论述存在逆向选择（指在市场上交易的标的物的特征因素虽然不为人知，但是会随着价格或合

4 的确，我在 *Wither Socialism* 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只要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教条）的假设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尤其是市场社会主义）就会取得成功。理解信息和市场的不完全性的影响，不但有助于我们弄清市场为什么会失败的原因，而且有助于我们认识其他模式通常会失败的原因。

同的其他条款的变化而变化的情形)和道德风险(指虽然无法完全准确地观察到行为,但是可以利用价格或其他合同条款来改变行为的情形)时的市场均衡的数篇经典论文。

第一卷中的论文,还阐述了价格机制在传递信息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这个作用与标准的竞争均衡模型描绘的情形有着显著的差异。另外,有些人认为,由于相关的信息都反映在价格上了,因此价格会将知情人掌握的所有相关的信息传递给不知情人,并据此而断定股票市场是有效率的。我的研究表明,从经济学逻辑的角度看,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结合第二卷中的相关论文,就可以理解股票市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但有限的作用。

第一卷中最为重要的一篇文章指出,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即在竞争性市场上,个人自利动机以及企业使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会促使资源达到最优配置——在现实中并不成立。通常人们看不见“看不见的手”的原因,是不存在这么一只手。换言之,市场经济一般都不是帕累托有效的。在使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典研究中,阿罗和德布鲁指出,在完美信息和完备市场条件下,竞争性市场通常都是(帕累托)有效的。在某种意义上讲,这实际上就表明,市场的有效性是有前提条件的。相反,我认为,在信息不完美、市场无法实现(帕累托)效率的现实世界——几乎总是有些政府干预措施能使得每个人的生活都变得更加美好。这篇论文还解释了为什么对经济实行有效分权的能力是有限的。今天,没有一个严肃的学者会相信,不受任何约束的市场本身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这篇文章解释了为什么是这样的。现在,关于政府作用的争论,不再以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为主题,而是集中在政府是否可以比市场做得更好这个问题上。也就是说,当前讨论的核心是政治学中有关政府局限性的争论。尽管在许多市场失灵现象的背后,是治理上的失败。但是,事实上,在任何成功的经济体中,政府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不但包括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平衡,而且还包括对两者的改革:我们如何才能使市场更好地运行,以及如何才能让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

第二卷考察了第一卷中的一般理论在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上的具体应用。例如,第二卷中的论文发展了一个分析薪酬问题的一般理论,用来解释为什么同一种商品(或具有特定技能的劳动力)在市场上的价格(或从市场上得到的工资)通常并不是一样的,以及由于信息的不完美产生的竞争的某种局限性。

第二卷中的文章还展示了如何利用新经济分析范式来分析企业的组织和

行为。这种新企业理论，在第三卷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它为第四卷中的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微观基础。

例如，新的信息范式，为我们分析公司治理和公司财务这两个老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20世纪90年代的公司丑闻发生之后，人们开始讨论公司治理问题。企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之后，公司治理问题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我早期的论文，最先提供了一个用于分析公司治理的一般理论。它解释了为什么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公司治理问题的出现，以及为什么公司治理问题既普遍又深奥，而且难以解决。

第三卷广泛地讨论了微观经济学其他领域中的一些问题，同时还收录了几篇信息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的开山之作：什么是风险？在什么条件下我们才能说某种情形比另外一种更有风险？风险是怎样影响行为（尤其是企业行为）的？当风险市场不完全时，经济会有什么反应？当然，第一卷和第二卷中分析不完美信息的论文，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风险市场通常都是不完善的。我们考察了在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信念存在差异的条件下，企业的行为会是怎样的。我们还进一步分析了当不存在完备的风险市场（阿罗—德布鲁证券）时，企业的行为会是怎样的。

在我看来，第三卷中最为重要的研究结论，就是那些关于存在风险时竞争性经济体的效率问题的结论，以及那些考察创新和技术进步的结论。专门为此卷而新写的一篇文章（第三卷最后一篇文章），综述了我在此主题下发表的大量论文，并且将有关市场经济效率问题的争论置于特定的背景之中。

尽管我强烈地批评了标准的竞争模式与以其为基础的政策建议的实用性，但是同时我也指出阿罗—德布鲁模型低估了竞争的重要性。这是因为：(a) 该模型低估了竞争所提供的信息，而后者可以作为设计更好激励机制的基础；⁵ (b) 在人可能会犯错误的前提下，它低估了分权所带来的决策分散化的价值；⁶ (c) 它没有强调竞争对创新的激励作用。事实上，正如我在

5 参见 Nalebuff and Stiglitz, 1983, "Information,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3 (2), pp. 278 - 284 (中文译文见第一卷); 1983, "Prizes and Incentives: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Compensation and Competition,"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4 (1), pp. 21 - 43 (中文译文见第二卷)。

6 参见 Sah and Stiglitz, 1985, "Human Fallibility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5 (2), pp. 292 - 296 (中文译文见第二卷); 1986, "The Architecture of Economic Systems: Hierarchies and Polyarch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6 (4), pp. 716 - 727 (中文译文见第二卷); 以及第二卷序言中提到的其他论文。

前面所指出的那样，标准模型假定技术是不变的（最多也就是外生的）。

标准模型忽略创新的原因，与忽略信息不完美性的原因非常相似。这是因为，标准的（瓦尔拉斯式的）竞争分析已经将经济学界引向了这样一个方向：在此方向下，技术和偏好不变的模型得到不断的精炼改善。虽然也有一些建模方法可以考虑引致性创新和创新的微观经济学，但是它们一直都没有进入一般均衡分析领域。我很早就认识到，⁷可以将学习新技术的研究活动视为一个获取特定信息的过程。尽管这一过程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我当时所关注的信息甄别过程，但是两者之间也有诸多共同之处，比如都与可占用性有关。

约瑟夫·熊彼特，在其20世纪上半叶出版的著作中，突出地强调了动态竞争的重要性。不过，他的成果是在用数理模型去分析创新这一潮流兴起之前完成的。在第三卷收录的几篇论文中，我着手建立研究创新的更一般的模型，并且开始将熊彼特式竞争置于更为坚实的数理分析基础之上。可以这样说，这几篇论文提供了一个能够分析新经济（也称为信息经济或创新经济）的理论框架。

标准竞争模型的支持者在捍卫其观点时最常用的一招就是认为：即便是在规模报酬非常明显（以及创新非常重要）的条件下，发挥重要作用的不是实际的竞争，而是潜在的竞争。只要市场是可竞争的，竞争就会存在，即便此时市场上只有一家企业，它也是有效率的。我们说明了这个结论为什么是错误的——只要进入或退出的沉没成本不为零，市场就不会是竞争性的。像微软这样的主导企业可以将优势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它这样做会抑制创新。看到这项研究成果在人们考虑新经济中的反托拉斯政策时发挥了作用，我感到很欣慰。

在20世纪30年代，微观经济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进展，就是爱德华·张伯伦发展的垄断竞争理论。⁸在许多市场上，企业的数目足够多，以至于没有一家企业会担心其行为会对其他企业产生影响（即不存在策略性互动），然而企业的数目却又足够少，以至于（在给定的产品多元化程度时）所有企业都面临着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尽管这一理论非常重要，但是它一直都没有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直到我和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为止。从此，这一理论广泛地

7 参见 J. E. Stiglitz, "Information and Economic Analysis," in *Current Economic Problems*, J. M. Parkin and A. R. Nobay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7-52, 以及在第三卷中的关于创新的有关文章。

8 Chamberlain, E. (1933), *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